

中国慈善与救济

THE CHARITY
AND RELIEF
OF CHINA

王俊秋 著

中国慈善与救济

THE CHARITY
AND RELIEF
OF CHINA

王俊秋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慈善与救济 / 王俊秋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04-7172-1

I. 中… II. 王… III. ①慈善事业—研究—中国②社会救济—
研究—中国 IV. 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0515 号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孙文红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1)
一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2)
二 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5)
三 佛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10)
第二节 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5)
一 中国古代的慈善活动	(15)
二 中国近代的慈善活动	(17)
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18)
第三节 慈善事业的含义及作用	(20)
一 慈善的含义及特征	(21)
二 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	(23)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慈善救济	(29)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慈善救济	(30)
一 灾害救济	(30)
二 贫困救济	(34)
三 恤老慈幼方面的慈善救济	(36)
第二节 两汉时期慈善救济	(38)
一 官方的慈善救济	(39)
二 宗族救助和民间义行	(4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慈善救济	(49)
一 官方的慈善救济	(49)
二 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济	(54)
第四节 隋唐时期慈善救济	(57)
一 官方的灾害救济	(58)
二 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济	(60)
三 官方的其他救济措施	(63)
第五节 宋元时期的慈善救济	(66)
一 宋代官方的慈善救济	(66)
二 宋代民间的慈善救济	(77)
三 元代慈善救济	(81)
第六节 明清时期慈善救济	(88)
一 慈善救济出现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趋势	(89)
二 官方的慈善救济	(90)
三 民间的慈善救济	(101)
四 官民合办机构的慈善救济	(105)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慈善救济评介	(108)
第一节 中国古代慈善救济的特点	(108)
一 中国慈善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108)
二 中国古代慈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11)
三 政府主导的慈善是古代慈善的基本特征	(117)
四 中国古代慈善救济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119)
五 中国古代慈善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122)
第二节 中国古代慈善的局限性	(125)
一 慈善救济的范围有限	(126)
二 慈善救济的方式单一	(129)
三 慈善区域发展不平衡	(131)

四 民间慈善发展及救助效果有限	(134)
第四章 中国近代的慈善救济	(138)
第一节 晚清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	(138)
一 近代传统慈善事业的衰败	(138)
二 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	(143)
三 近代慈善理念的形成	(151)
第二节 晚清时期的慈善救济	(162)
一 慈善机构的近代化趋势	(162)
二 慈善地缘色彩淡化	(166)
三 善款筹集的多元化	(167)
四 慈善机构管理模式的近代化	(169)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慈善救济	(171)
一 民国慈善事业繁荣的社会背景	(171)
二 民国时期的慈善救济机构	(175)
三 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发展的特点	(187)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后慈善事业的发展	(198)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慈善事业的衰落和 社会救助	(198)
一 接收、改组旧有的慈善机构	(199)
二 新中国社会救济体系的构建及救助	(203)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局限性	(210)
第二节 现代慈善事业的消退与停滞	(218)
一 现代慈善事业消退和停滞的原因分析	(219)
二 改革开放前的特殊慈善事业	(223)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慈善事业的复兴	(225)
一 慈善事业发展条件的初步成熟	(225)

二 慈善组织的重新建立	(227)
三 筹集善款、善物多渠道化	(231)
四 改革开放初期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	(232)
第四节 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233)
一 慈善事业发展环境的改善	(234)
二 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及救济	(241)
三 从汶川地震救灾看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253)
第六章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263)
第一节 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63)
一 慈善意识、慈善文化缺失	(264)
二 慈善组织发展不完善	(269)
三 慈善事业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	(273)
四 政府没有摆正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地位	(281)
五 慈善事业发展中缺乏有效的监督	(283)
第二节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策略	(287)
一 慈善文化的培育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	(288)
二 加强和完善慈善组织建设	(294)
三 加强慈善事业法律制度建设	(298)
四 明确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303)
五 加强慈善事业监督体系的构建	(309)
后记	(317)

第一章 绪论

中国慈善事业的产生及其发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先秦时期，孔孟、老庄等诸子学说体系里即孕育着慈善思想的精蕴，譬如儒家言“仁爱”、“仁政”，道家言“赏善罚恶，善恶报应”，墨家言“兼相爱”。两汉以后，佛教的慈悲观、业报说和功德观等都是中国慈善事业兴起、发展的思想渊源。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慈善思想的影响，我国慈善事业经历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慈善事业也由古代官方救济为主，发展到近代以民间救助为主，再发展到今天中国慈善事业的繁荣，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勤劳、善良和智慧的民族。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着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不仅蕴涵于诸子百家的慈善思想体系之中，深植于中华儿女的道德理念和价值信仰之中，体现于社会大众自觉自愿地扶贫济困的朴素行为之中，而且还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文明和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脉的儒家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就提出了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并以此形成了儒家慈善思想的基础。

（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慈善文化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孔子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仁”确定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准则，并围绕“爱人”的内涵，构造出了仁学的思想体系。仁爱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后来发展成整个儒家文化的中心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慈善救济的思想渊源。

儒家的“爱人”是“仁”的基本出发点。“仁者爱人”^①是孔子对仁的诠释，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包括：“仁”是人先天固有的善德；“仁”是人所普遍具有的；仁者爱人；爱有差等性。仁是人所普遍具有的美德，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②也是在阐述“仁”的自然性和普遍性。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爱是有差等的，它以人伦之爱为中心，把亲情摆在首要位置。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忠恕”开始，实现道德践履。孝悌是为仁之本，从孝顺父母的人伦道德中引申出爱民守礼的善念和品质。忠恕之道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它从内心反省来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强调与人为善，做到利人利他。所以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

孟子在孔子以忠孝作为爱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其仁爱思想，提出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③的思想。对统治者提出“不忍

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孟子·告子》上。

③ 同上书。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恻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孟子“仁政”的基础，即是“仁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①他还指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可见，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是对别人痛苦、危难的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同时他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人不仅骨肉之间赡养扶助，而且希望没有血亲关系的人也要相助相睦，以此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

（二）儒家的民本思想

“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春秋·穀梁传》提出了“民者君之本也”的观点，说明民本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以治国方略而出现的。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及至孔孟时期对此有了发展。孔子的民本思想以仁为核心，他认为仁的最根本的精神在于爱人以及推己及人，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应该将仁爱之心推于天下百姓，主张“为政以德”，反对严刑酷法，主张要养民也惠，“使民以时”，轻徭薄赋，取民有度。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仁心”和“仁政”，主张对人民施仁政，推恩保民，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的思想。荀子主张统治阶级应该实行爱民养民的仁政，“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让老百姓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孟子·尽心》下。

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财”^①，更是明确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②等思想。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仁民爱物、与民同乐的亲民、爱民、顺民、为民、养民、保民、安民、利民、贵民等民本主义思想。民贵君轻、君为舟庶人为水思想的提出，一方面表明它与儒家的仁爱观有着紧密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民本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内涵已十分丰富和完备，儒家的民本思想也从此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实行种种惠民政策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三）儒家的大同思想

大同是中国人民两千年来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代名词，《论语·季氏篇》里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里反映了孔子主张财富均分，反对贫富悬殊。而在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子以称颂尧舜禹三代的口气将大同世界描绘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③这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经典描述：在政治上，《礼运》大同追求天下公有、选举贤能；在经济上，它追求共同劳动、人人为公、各得其所、丰衣足食；在社会道德上，它追求讲信修睦、相互关爱，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够安定地生活；在社会秩序上，它追求路不拾遗、夜不闭

① 《荀子·王制》。

② 同上书。

③ 《礼记·礼运篇》。

户、祥和安宁、无奸无盗。随着儒家正统思想地位在西汉确立，这一社会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稍后，孟子提出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图景。在中国漫长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所蕴涵的“公有”、“平等”、“互助”、“仁爱”、“和谐”等意识深刻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施政方针，同时也不断成为寻求解决社会问题先贤的社会主张。儒家的大同思想构成社会和谐，济贫弱、助危困的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

儒学思想自先秦创立至今，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我国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并深刻影响着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儒家的“仁爱”学说可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伦理前提；儒家关于同情方面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慈善事业赖以生成和壮大的强大心理和文化机制；儒家仁政学说同其民本思想相辅相成，合为一体，成为历代统治者实行王道政治，广行慈善的政治基础，为慈善事业在中国古代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民本思想、仁政观念、义利价值观和对大同世界的向往都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支柱、道德标准、价值导向等，从而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价值理念，成为人们参与慈善的原动力。

二 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东汉末年创立的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善恶因果报应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一）道家的善恶观

早在《周易·坤·文言》中即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论说，老子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善恶观。

在老子看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作为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伦理标准和取舍善恶的行为准则，并衍生为中土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看法。老子的“善”，是指自我品质、智慧、行为的最高境界，是天道的本质，因而强调慈善，与世无争；同时也认为人只有保有慈善的心，与世无争，才能与道相应，“天道无常，常与善人”。^① 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之源，不可名状，亦无法察知，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由此，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② 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社会走向至善。这种观点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便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

《道德经》中说：“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长。”^③ 在这里“慈”居三宝之首，“慈”就是慈爱、慈善、慈祥，以父母慈爱之心来慈爱天下百姓，慈爱宇宙万物。在老子看来，道的慈爱是无等级、无差别的，没有高低贵贱、好坏美丑之分，体现了它包容天下一切的爱，从而形成一种对万事万物普遍的、平等的同情，这为人们做善事提供了原动力。老子对“俭”的看法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勤俭节约，第二层意思是节制欲望。道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少私寡欲”。《老子·四十六章》有言：“……罪莫大于可

① 《老子》第七十九章。

② 《老子》第四十九章。

③ 《老子》第六十七章。

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所以人活在世上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可浪费挥霍，那么作为人来说既有对人、对物的慈爱之心，又不要去挥霍财物，那么当人们富裕了以后接济别人，向社会奉献爱心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① 在这里，老子认为慈善的最高境界应该像水一样，因为水滋养万物却不求回报，这样的德行，乃至仁至善。人与人交往要善于讲求仁道，当政要善于管理，所做事情要能充分发挥你的能力，办大事要善于选择好的时机，但不要与人相争，才不会有错。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③ 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这一思想为统治者施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慈善救助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道家的善恶报应观

“承负”思想是《太平经》中阐述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发展和补充了“善恶报应”的伦理观，成为道教立教的理论依据，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众行善止恶心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太平经》的“承负说”是指，今人受到的祸福归结为祖先的行为恶善，同时今人的善恶行为也会使后代得到相应的福祸结果：先人有过失遗其恶果于后代，为负；后人承受先人过失的恶果，为承；代代既相负更相承。同样，前人为善，后人亦有福荫。在

^① 《道德经》第八章。

^② 《老子》第八十一章。

^③ 《老子》第八十章。

这种因果关系下，任何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后代子孙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太平经》中认为：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

承负说作为“天道”在起作用的善恶报应观，以天道、地道论人道，体现了“天人一体”的神学思想。《太平经》强调：“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纲，道之信，道之所因缘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长，德之纪，德之所因缘而止也。”因此人们当奉天地，法天道，得天心，顺天意。天可顺不可违，顺之则昌，逆之则危。所以《太平经》虽然强调人的生命与“天道承负”息息相关，即人的生命先天地被置于天道承负的循环中，但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来承受的，人可以通过奉天地、顺五行、习道术、积善功，不负止厄。所以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毫不爽。这就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道家的承负说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太上感应篇》中推崇“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的道教宗教伦理。它宣扬“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算尽则死”。^①对于得善者“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②，而对于作恶性之人，“大则夺纪，小则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

^① 《太上感应篇》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②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心实之”，“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①。因此，人们要想生活美满，长生成仙，必须积德行善。道家的这种善恶报应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为，并衍化为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

（三）明确的善恶标准

《太平经》中关于善恶的标准，认为最重要的是孝、忠。行孝者可被荐举，现世荣贵，天佑神敬，乃至白日升天；不忠不孝者，罪不容诛，天地鬼神皆恶之，令其凶夭，魂神受考。因此，要做明君、良臣、顺民，力行忠孝。除了忠孝，还反对贪念和为富不仁，提出了“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的思想，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②。所以道家思想认为为富不仁有违天道，不仅造成个人的报应，而且子孙后代也难逃承负之厄，受到牵累，依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家强调的义利观。

道教经籍《太上感应篇》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劝善书。它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诸如“不履邪经，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等。所谓恶行，主要是指“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太上感应篇》

^① 《太上感应篇》引自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第5页。

^②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页。

通篇千余字，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并谆谆相诫不要“非义而动，背礼而行”，不应“以恶为良，忍作残害，阴贼良善”。^① 这部著作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具体的标准，特别是它的“施恩不求报”的思想更是蕴涵了现代慈善事业自愿性和利他性的思想。

三 佛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佛教作为一支外传宗教是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我国的，并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佛教在弘扬人生精神解脱的同时，还担负着扶世助化、劝善化俗的宗教使命。佛教中的慈悲观、修善功德观和因缘业报说对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佛教的慈悲观

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慈悲一般作“怜爱”、“怜悯”、“同情”等解。“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② 在这里慈悲即是拯救正在饱受困苦折磨的生灵，并使其生命充满永恒的快乐。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以此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的慈悲就是一种完全利他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正是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出发点。

佛教慈悲的具体实践是布施。佛教这样解释布施，“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为布；辍己惠人，目之为施”。^③ 菩萨道德修养包括“四摄”、“六度”。“摄”有引导之意，即菩萨

^① 周秋光、徐美辉：“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道德与文明》2006年2期，第4—8页。

^② 《佛说象法决疑经》大智度论卷27，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5页。

^③ 《大乘义章》卷12。